

五代祀天祭祖礼考述

耿元骊*

(辽宁大学 唐宋史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136; 东北师大 世界文明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祀天祭祖礼作为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权力来源合法化的主要标志。五代吉礼特别是祀天祭祖礼在乱世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更多更好的施行,传世的材料也相对多一些,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五代时期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分为昊天上帝和祖宗两个部分进行了排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五代祀天祭祖礼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五代;祀天礼;祭祖礼

中图分类号:K24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3-0092-06

五代干戈相寻,乱世朝祚既短,于礼制亦少创设,五代代人自己也说“文章礼乐,并是虚事”,^[1](卷一〇七《汉书九·杨邵传》)而相关史料更是缺乏。虽然有《五代会要》,但是其礼制材料不仅残缺不全,零乱无章,前后失序,而且多经过王溥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本身的面貌。《旧五代史》虽有《礼志》,但主要叙述了宗庙方面的情况,且记事简略。《新五代史》、《册府元龟》、《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全唐文》等书中也有很多礼制史料,但散见重出,并不能一览五代礼制的基本情况。而且,五代以后人一般都认为五代无所谓“礼”,因而也不用知道了解。欧阳修甚至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2](卷五八《司天考第一》)在其书中取消了“礼”志,也直接造成了五代礼制史料的湮灭。

现代学者对五代礼制研究也很少。陈成国著《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13]于五代礼制研究有开创之功,但其是在隋唐之后附论五代,各礼多言之不详。似乎还有些体例混乱,如其将军礼和田狩礼并列,而所谓田狩礼是包括在军礼之内的。类似之处还有一些,亦可参见雷闻的书评。^[16]吴丽娱著《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14]中偶尔涉及到了五代礼制。此外,笔者的硕士论文^[18]是关于五代礼制的,盛险峰的博士论文^[17]也有一章涉及了这方面,王美华研究了十国礼制。^[15]

五代祀天祭祖礼作为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权力来源合法化的主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施行,传世的材料也相对多一些,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上述陈著五代祭祀之礼部分虽也主要以郊祀和宗庙为主,不过略显散乱,史料排比无序,难以使人对五代祀天祭祖礼有明确的了解,其他学者的论述也涉及不多。但无论如何,前人的学术成果值得我们重视。本文即是在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钩沉索隐,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力图较为完整的反映五代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基本面貌。

一 昊天上帝

五代历五十三年八姓十三帝,于祀天之礼应当说是重视的,后梁祀天,还形成了一部《朱梁南郊仪注》。^[11](卷六四《艺文略》二)①不过五代祀天,基本是草草成礼,聊具其意而已,并没有新的创造,也未能对礼制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唐《开元礼》定冬至、正月上辛、孟夏及季秋皆祀昊天上帝,以五方帝从祀。后梁开平二年(908)正月,宰臣请郊天谒庙,故正月己亥,三月癸巳^[2](卷二《梁本纪第二·太祖下》)两次卜郊,选定四月二十四日。但是不久就暂停了,七月太祖又加以催促:“如闻官吏慢于恪敬,礼容牲选,有异精度。宜令御史台疏其条件奏闻。”因由魏博镇助修,细观其意,似暗指工程进度太慢。此后,礼仪使奏拟开平二年十一月己丑冬至于南郊行礼,因工程难以完成,加以此年春天亢阳少雨,七月又大雨泛滥,五月征潞州大败,政治、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十一月,太常礼院奏请选用来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亲祭南郊。但正月之祀,当用上辛(辛未),而辛卯则已二十四日,选此日亲行祭天之礼,似与礼不合。本年冬至日,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4](卷

收稿日期:2006-01-20

作者简介:耿元骊(1972—),男,吉林龙井人,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唐宋史。

① 此书无撰人,似未传世,一般认为是五代时作品。可参考张兴武著《五代艺文考》,第86页。

一九三《閤位部·崇祀》) 开平三年(909)正月,宿斋三日,庚寅日亲飨。^[4](卷一九三《閤位部·崇祀》) 辛卯日,则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登五凤楼,大赦天下,赐南郊行事官礼仪使赵光逢以下财物。^[1](卷四《梁书四·太祖本纪四》)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祀典仪式:卜郊选日,任命官员,修制法物,宿斋飨庙,圜丘行礼。礼毕多行大赦,加官分物。后梁以下各代,基本如此模式。但卜郊之仪,梁后少见,只有后周时又再次施行。

开平三年三月,又命遣宰臣薛贻矩赴西都以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此则完全是根据《开元礼》的相关规定来行礼的,而且还实行了告谢南郊之礼。七月甲戌,梁太祖颁申谢南郊诏,从此诏来看,是因为征战取胜,感谢上天,应当告谢,所以准备亲拜郊祀。有司定日大约为九月,但太祖以九月多雨,故“宜令别更择日奏闻。”^[4](卷一九三《閤位部·崇祀》) 礼仪使又奏:“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阳生之辰,宜行亲告之礼。”则定于十一月二日再次到洛都行郊祀之礼告谢。其行礼过程:“十一月癸巳朔,帝斋于内殿,不视朝。甲午,日长至,五更一点自大内出,于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凤楼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仪仗法驾卤簿及左右内直控鹤等引从赴坛,文武百官太保韩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坛告谢。”丙申日,敕于上东门外。此与礼不合,前代并无郊后畋猎的制度。开平四年(910)九月丁亥,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圜丘。^[1](卷五《梁书五·太祖本纪五》)

此则为季秋祀昊天上帝之礼,亦唐礼之遗意。乾化三年(913)正月,朱友珪也祀天于洛阳南郊,并且改元凤历。^[1](卷一三《梁家人传第一·博王友文传》)

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十二月己巳,卜郊,^[2](卷三《梁本纪第三·末帝》)并来到洛阳。此时战乱大起,虽已卜郊,但对于是否真的行郊礼,还有争论,租庸使赵巖认为应当郊天,“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犹未郊天,议者以为朝廷无异藩镇,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虽失,天下幸安,愿陛下力行之。”^[2](卷四二《杂传第三十·赵准传》)

而宰臣敬翔则认为:“府藏殫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1](卷九《梁书九·末帝本纪中》) 末帝支持赵巖的意见,但不久因战略要地杨刘城失陷,郊礼遂停。

后唐行郊天之礼较梁则严谨的多,庄宗则是五代唯一一位先祭昊天上帝,然后登基即位的皇帝。同光元年(923),“夏四月己巳,帝升坛,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僚称贺。礼毕,御应天门宣制:改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大赦天下”。^[1](卷二九《唐书五·庄宗本纪三》)

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子,准备到洛京南郊。^[5](卷一〇四《幸洛京祀南郊敕》) 十二月庚午到达西京,但第三天(壬申)就改为来年二月一日再行郊礼。己丑,有司上言请定祭祀大礼及配飨神主:“上辛祈谷于上帝,请奉高祖神尧皇帝配;孟夏雩祀,请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请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请奉献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请奉懿祖昭圣皇帝配。”^[1](卷三〇《唐书六·庄宗本纪四》) 此全为《开元礼》之意。同光二年(924)正月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庙,旧例亲王充亚献、终献行事。”此亦是仿行唐制,最终决定以皇子继岌为亚献,皇弟存纪为终献。此次南郊为天地合祭于圜丘之礼。^[3](卷二《亲拜郊》杂录)

其行礼程序,则是正月丙寅日,皇帝帝赴明堂殿致斋。丁卯,朝飨于太微宫。戊辰,飨太庙,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宰臣率百官就次称贺,还御五凤楼。”^[1](卷三一《唐书七·庄宗本纪五》) 当日并大赦天下,赐官减赋。

明宗即位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根本没有考虑郊天祀地之礼。至天成四年(929)七月壬辰,才决定来年二月南郊。^[5](卷一〇六《有事南郊制》)① 八月甲辰,命冯道为南郊大礼使。^[1](卷四〇《唐书十六·明宗本纪六》) 其具体的行礼日程,二月壬子日,宿斋于明堂殿。癸丑,朝献太微宫。当天宿斋于太庙。第二天晨行飨礼。甲寅,赴南郊斋宫。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礼毕,郊宫受贺,并改天成五年为长兴元年(930)。随后大赦天下,赐官分物,减免税赋。^[1](卷四一《唐书七·明宗本纪七》)②

而末帝未行郊天之礼,先举祀地之仪。清泰元年(934)四月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献祖室,不坐。”^[1](卷四六《唐书二十二·末帝本纪上》) 这大概是五代时期仅有的一次史有明文记载的单独祀地之典。其它各代各帝,行天地合祭之礼或有之,但独祀地祇,仅此而已。这也是仿行唐礼,武德之制,所谓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12](p39) 清泰二年(935)十二月戊寅,定来年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1](卷四七《唐书二十三·末帝本纪中》) 但政局急转直下,估计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操作,故史无明文。

后晋有国十一年,明文载于史册的祭天祀地之礼一次也没有。这是因其由契丹册立,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已由契丹赋予,若行祭天祀地之礼,则表示自己的权力直接来自昊天上帝,此置契丹的封册于何地?所以,后晋但有祭祀祖宗之礼,不敢行祭天祀地之仪。陈戌国先生认为:“天神之祭,儿皇帝岂敢付诸阙如?”^[13](p426) 似不成立。天神之祭,儿皇帝正是要“付诸阙如”。出帝即位,对契丹逐渐取强硬态度,^[1](卷一三七《外

① 其中说“取来年二月十一日”,疑误。《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一六》、《册府元龟》卷三四《帝王部·崇祭祀三》所载均为乙卯(二月二十一日)。

② 其原赦文见《全唐文》卷一一二《南郊改元赦文》。

国列传第一·契丹》^①亦打算行郊天祀地之礼，天福七年（942）十一月辛丑敕：“天地宗庙社稷及诸祠祭等，……祭器祭服等未备者修制。”^{〔1〕}（卷八一《晋书七·少帝本纪一》）这正为行郊天祀地而作准备。而开运二年（945）夏四月丙子还曾行过告社稷，不过推其本意，还不是正式的祭祀典礼。^{〔1〕}（卷八三《晋书九·少帝本纪三》）

后汉国祚四年，史无明文行郊天祀地之礼。乾佑元年（948）六月太常礼院奏定祭庙规制，其中说：“正月上辛祈谷，四月孟夏雩祭及夏至，九月季秋大享明堂，十一月冬至皆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十月孟冬神州地祇，皆以祀前二日准礼例奏告太庙一室配座并四孟月及腊飨于太庙。”可见后汉是打算行祭祀天地之礼的。又乾佑二年（949）司封郎中裴巽上言奏请修斋宿屋宇，其中说道：“国家郊庙社稷百神祀祭，皆在洛阳，臣每见差官行事”。^{〔4〕}（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大概是有行郊礼之意图，不过并未真正的实行过。

后周太祖因有占卜术士建议迁都散财，而太祖认为迁幸烦费，不可轻议。遂借此为由，行郊禋之礼。^{〔1〕}（卷一一三《周书四·太祖本纪四》）太常礼院完成了郊庙圜丘的尺寸、社稷坛的规制、祝版、珪璧尺寸等等的设计工作，这大概是五代时期对行郊天准备最为充分的一次。广顺三年（953）九月，太常礼院奏请定郊庙圜丘制度：

准敕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十有二陛，每节十二等。燎坛在泰坛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阔上南出，户方六尺。^{〔3〕}（卷二《亲拜郊》杂录）

这是五代唯一有明确记录的圜丘设计，而制度全承唐制。在制定圜丘制度的同时，后周太祖亦有意行祭社稷之礼，“时太祖将行郊礼，故迁社稷于东京修之。”^{〔3〕}（卷三《庙制度》）故太常礼院又奏：

社稷制度，社坛广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筑之。稷坛制度如社坛之制度。社坛石主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半根在土中。四垣华饰。每神门屋三间，一门，门二十四戟，匹隅连饰罍罍，如太庙之制。中可树槐。准礼，左宗庙，右社稷，在国城内。^{〔3〕}（卷三《社稷》）

其所定坛、石、戟等规制，亦仿行唐制。是月，南郊礼仪使又奏请定珪璧制度。十月，礼仪使关于版册的奏中说道：“（用祝版）梁朝依礼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册。今详酌礼例，允以祝版为宜。”^{〔1〕}（卷一四三《志五·礼下》）此时亦行卜郊之礼，“是冬，卜以来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2〕}（卷一二《周本纪十二·世宗》）“礼仪使言，来年正月一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于圜丘。”^{〔4〕}（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可知其祀为合祭天地。唯其日定于丙子，而正月祀昊天上帝当用上辛，此用初一。

其行礼程序：“（广顺三年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庙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飧，奉神主入于太庙，设奠安神而退。……癸酉，帝宿斋于崇元殿，为来年正月一日亲祀南郊也。……甲戌，宿于太庙。乙亥质明，帝亲飧太庙，自斋宫乘步辇至庙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升阶，止及一室行礼，俯首而退，余命晋王率有司终其礼。是日，车驾赴郊宫。”^{〔1〕}（卷一一三《周书四·太祖本纪四》）此五代行礼最为完善的一次圜丘大礼，郭威虽坚持亲祀圜丘，不过，其“仅能瞻仰致敬而已，进爵奠币皆有司代之。”^{〔7〕}（卷二九一《后周纪二》）车驾还宫，御明德楼，大赦天下，改广顺四年为显德元年，赐官分物，但未言减免税赋。宣赦完毕，受册尊号，群臣称贺。但是其行礼多阙，主要的原因是“以帝不豫故也。……洎岁暮，帝疾增剧，郊庙之礼盖勉而行之耳。”^{〔1〕}（卷一一三《周书四·太祖本纪四》）此次郊天大礼，准备之充分，行礼之完善，除了郭威的身体以外，都是五代最好的一次。

而后周世宗即位以后，似并未亲行郊天祀地之礼。但从显德二年（955）八月其与张昭、田敏等探讨祠祭用犊事宜时所定的原则：“起今后祭圜丘、方泽、社稷，并依旧用犊；其太庙及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并不用犊。如皇帝亲行事，则依例程。”其言“今后”且“依旧”，则亦可能遣有司行过郊天祀地之礼，其并言社稷，亦有可能行过祭社稷之礼。显德四年（957）四月，礼官博士等议祭器、祭玉制度，还发生了很大的争论。^{〔1〕}（卷一四三《志五·礼下》）不过由于天不假年，世宗不久于人世，未及郊天祀地，争论不了了之。

二 祖宗

五代对于宗庙非常重视，后晋立国十一年，不行郊天之礼，亦必立宗庙。后汉国祚四年，也致力宗庙。对于宗庙制度，比郊天祀地之礼更为重视。每一改朝，即先立宗庙。当然，这也是因为郊天祀地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且需要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而立宗庙并不需要更多的准备工作，也不需要更多的经济条件。其基本的制礼原则，仍是仿行唐制。

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追尊四庙，后唐庄宗同光元年闰四月追尊亲三庙及唐四庙共七庙，后唐明宗追尊四亲庙，后晋天福二年（937）五月追尊四庙，后汉天福十二年（947）闰七月追尊四亲庙及汉二庙共六庙，后周广顺元年（951）七月追尊四庙。^{〔3〕}（卷一《追谥皇帝》）而关于宗庙的争论则更多，特别是牵涉现实政治时。

后梁宗庙制度，史无明文。后唐由于已先在北都建立了宗庙，迁都洛阳后就产生了北都宗庙是否存留

①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言：“中国自有十万口横磨剑，要战即来！”

② 据《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书四》，则有司奏请在十月。未详孰是。

的问题。同光二年六月十日，太常礼院奏请废北都宗庙，经尚书省集议，认为“时日既同，神何所据”，请停北都宗庙。^[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但后唐立国初期，宗庙地位不高，祭飨太庙行事官员为庶僚，所以才有同光二年七月己亥中书门下奏：“每年南郊坛四祠祭，太微宫五荐献，并宰臣摄太尉行事，惟太庙遣庶僚行事，此后太庙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1]（卷三二《唐书八·庄宗本纪六》）

后晋立宗庙，君臣讨论的特别详细。可能是因为既已不能祀天，所以就大行祀人鬼之礼？天福二年正月，中书门下奏请：“皇帝到京，未立宗庙”，“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礼以闻。”^[5]（卷九六三《请建宗庙表》）二月，太常博士段颙列举了各种理由之后，请立七庙或四庙，但倾向于七庙。^[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经三省集百官讨论，左仆射刘昫奏请立四庙之外，再立一始祖庙。^[5]（卷八五三《议册四庙状》）而御史中丞张昭远不同意别立始祖之庙，主要理由是“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在列举诸多经典后，他建议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后晋高祖无从抉择，三月，经再次讨论，决定追尊四庙，不再别立始祖一庙。左仆射刘昫奏：“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请创立四庙之外，无别封始祖之文。……请依唐朝……，追尊四庙为定。臣等考详典礼，上奉圣明，虽共竭于恳诚，实倍惭于浅近。”^[5]（卷九七二《覆册四庙奏》）刘昫、段颙岂能不知“无始祖庙之文”？这里既明确强调说是据张昭远奏，又说自己“浅近”，分明是推卸责任。五月，太常卿梁文矩拟定四庙谥号、庙号、陵号，太常少卿裴坦拟定四庙皇后谥号。^[4]（卷三一《帝王部·奉先四》）七月壬申，高祖御崇元殿，备礼册四庙，以冯道为使，裴皞为副使，亲授宝册，赴洛京行礼。^[1]（卷七六《晋书二·高祖本纪二》）

后汉立庙，又有五庙、六庙争论。天福十二年闰七月，太常博士段颙奏：“立高、曾、祖、祢四庙，更上追远祖光武皇帝为始祖百代不迁之庙，居东向之位，共为五庙，庶符往例，又合礼经。”同样经尚书省百官集议，吏部尚书窦贞固请立六庙，包括高曾祖祢四亲庙，外立始祖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庙。^[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七月庚辰，最终定六庙之制。其追尊者为四，另奉西汉高祖皇帝、东汉光武皇帝为始祖不祧之庙，这又是特例，建两位不迁之始祖。马端临指出：“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远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华胄自诡，故于四亲之外，必求所谓始祖而祖之。张昭远之言，议正而词伟矣。至汉初，则段颙、窦贞固之徒，曲为谄附，乃至上祖高、光，以为六庙云。”^[10]（卷九三《天子宗庙》）

后周广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请依隋唐立四庙：“圣朝请依近礼，追谥四庙。伏恐所议未同，请下百官集议。”^[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和凝等议：“合据礼官议，立四亲庙，以叶前文。”^[3]（卷二《庙议》）郭威非如石、刘等胡人血统，也就不需掩盖身份，乱拉前代君主作为始祖，前引马端临所言极是。四月，中书门下奏定册庙仪制。^[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五月辛未，太常卿边蔚上追尊四庙谥议。丙子又上太庙四室奠献舞名。丙戌，任命宰臣冯道为四庙册礼使。七月辛酉，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庙四室宝册于中书令冯道等，赴西京行礼。^[1]（卷一一一《周书二·太祖本纪二》）

广顺三年九月，议于东京别建太庙。太常礼院奏请定新庙制度：“准洛京庙室一十五间，分为四室，两头有夹室，四神门每门屋三间，每间一门，戟二十四，别有斋宫，神厨屋宇，准礼，左宗庙，右社稷，在国城内请下所司修奉。”然后太常礼院又奏请讨论皇帝是否亲迎太庙社稷神主以及当服常服还是祭服的问题，最后决定车驾出城，服常服。^[4]（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

以上是五代关于庙制度的基本情况。庙既安置，当行禘祫之祀。祫者区分昭穆并合食于太祖，禘者审决其尊卑。五代各朝国祚虽短，亦有行禘祫之礼。

后梁及后唐同光天成年间，未行禘祫之礼。长兴元年九月，始行之。但是，由于后唐自命继唐，其所立宗庙以唐祖为祖，而且是以唐高祖为始祖，这就与唐朝宝应年间所定的百代不迁之始祖为景皇帝相矛盾。如果飨食以高祖居东向之位，则景皇帝、代祖就不得飨食，与其自命承唐相矛盾；如果飨食时再把景皇帝列在东向之位，则礼经不载，前代不行。因而太常礼院处于矛盾之中，所以奏请。^[1]（卷一四三《志五·礼下》）经尚书省集议，由户部尚书韩彦晖代表群臣上奏议曰：“请每遇禘祫之岁，暂奉景皇帝居东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下序列昭穆。群僚聚议，贵在酌中。”^[4]（卷五九三《掌礼部·奏议二一》）韩彦晖等是不以庄宗朝所定七庙为然的，所以其中说：“议出一时，制行七庙，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数，不列祖宗”。而明宗是企图承唐之余绪的，^①所以以高祖为始祖并不合适。又以所谓“本朝列圣之旧典，明皇定礼之新规”为依据，平时仍以高祖为始祖，居东向之尊；遇有禘祫，则以景皇帝居东向受飨。而“酌中”的说法，也道出了五代时期行礼中遇争论的一般作法。

后晋开运元年(944)秋七月礼官奏请祫祭后晋高祖：“天子三年丧毕，祫享于太庙，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丧终毕，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礼，冬季祠祭，改荐为祫。”^[1]（卷八三《晋书九·少帝本纪三》）此则合古礼，所谓丧毕行吉礼，就是三年祫、五年禘之礼。

后周广顺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请于孟冬十月祫祭：“祭礼宗庙之祀，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以禘，以孟夏，所以别尊卑，审昭穆也。四时之祭荐，其常事故。禘祫之月，则不行时飨，恭惟追尊四庙，经今

① 可参见《旧五代史》卷三五《唐书十一·明宗纪第一》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所议国号。

三年，准礼，合改十月孟冬，荐飧为祫并遍祭七祀。”但是礼官所奏，竟被史官所驳：“礼官谬举也，祫祫之祭，比以祧庙之主，经常飧，故有三年五年合食于太祖之礼，今太庙日至联栋而承五飧，何合之有言审昭穆者。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今但言三昭三穆而已，无劳审也。”^[4]（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史官的主要出发点是追尊的四庙已经承常飧，即昭穆已分，秩序已明。且未有藏于室中得不到血食者，也就不需要申昭穆，行祫礼了。礼官、史官所言，皆有所本，而就实际状况而言，礼官拘泥于礼经，食古不化，而史官则与时变化，较为切合实际。但史官的言论中，隐含着需祧庙之际，才可行祫祫之礼的意思。至显德五年(955)六月行祫于太庙之礼时仍有人持此议，以为王家宗庙无祧庙之主，不当行祫祫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不同意此论，认为前代备庙，累迁及追尊未毁者皆有祫祫，所以援引故事九条为证。^[3]（卷三《庙制度》）疏奏上，世宗从之。这其中可看出后周关于祫祫之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广顺年间所从者，为不祧迁则不行祫祫；显德年间所从者，为追尊未毁者皆有祫祫。

五代之时，亦有神主升祔，当行祧迁之礼。同光三年(925)十一月戊申，祔贞简皇太后神主于太庙。^[1]（卷三三《唐书九·庄宗本纪七》）这大概是五代第一次行升祔之礼。己丑，礼仪使上奏请贞简太后升祔礼毕请行享祀，其中说“事久相沿，礼从顺便”，所以“园陵已毕，祥练既除”后就可以飧庙祀神，直接就突破了三年不祭的古礼，^[5]（卷九六九《贞简太后升祔礼毕请行享祀奏》）^①这是五代时期礼制发生的重大变化。

天成元年(926)八月丁亥，庄宗神主祔庙，当有祧迁之行，太常礼院奏：“庄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庙，七室之内，合有祧迁。”^[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②经中书门下奏议，请祧懿祖一室，百僚集议，礼部尚书萧顷覆奏说：“中书所定祧迁，于议为允。”^[5]（卷八四四《议覆中书请祧懿祖奏》）

应顺元年(934)正月，明宗当祔庙，又有祧迁之礼。中书门下奏请祧迁献祖，经尚书省集议，太子少傅卢质奏曰：“须禀于新规”，“既协随时之义，又符变体之文”，^[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同意祧迁献祖。这种办法于礼不合，王溥指出：

时议以懿祖赐姓于懿宗，以支庶系大宗，例宜以懿祖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尧而宗太宗。若依汉光武，则宜于代州立献祖而下亲庙，其唐庙依旧礼行之可也，而议谥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称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将朱耶三世与唐室四庙连叙昭穆，非礼之甚也。议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献祖。以礼论之，始祧昭宗，次祧献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岂可祧乎？^[3]（卷二《庙仪》）

皇帝所行却是前者，可见乱礼之甚。其诸多纷繁之事，全由其企图承唐而致。既以唐祖为祖，又不想完全放弃自家亲祖，更要把自家祖宗和唐朝祖宗混合起来，所以才发生诸多混乱。但无论如何，五月二十日，明宗祔庙结束。^[1]（卷四六《唐书二十二·末帝本纪上》）

后晋天福七年七月，因高祖石敬瑭死，又有祧迁之礼。太常礼院奏请仿升祔唐高祖的办法，不祧迁任何庙主，只是又增加一庙，由四庙增为五庙。^[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十一月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庙，^[1]（卷八一《晋书七·少帝本纪一》）十二月二十日祔飧于太庙。^[5]（卷九七四《奏定高祖郊坛配坐状》）

后汉隐帝乾佑元年九月，高祖刘知远神主将升祔太庙。因为后汉是以西汉高祖、东汉光武为不迁之始祖，下为文、德、翼、显四祖，所以当有祧迁之事。有司上奏议请祧文祖明元皇帝室神主，并置于夹室，遇有祫享即出之。^[4]（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不过未等到祫祭之日，国已灭亡。

后周太祖之祔庙祧庙，史无明文。后周世宗祔庙，当有祧庙。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也曾论奏过太庙迁易夹室，以便安置的问题。^[3]（卷三《庙制度》）不过转年后周即亡，关于其神主的讨论就无所用处了。

五代承唐制，祀天大典必以祖宗配享。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太祖初受禅，立四庙于西京。^[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开平三年正月辛卯祀昊天上帝，又迁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1]（卷四《梁书四·太祖本纪四》）十一月告谢昊天上帝，“梁太祖二飧庙。开平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其年十月三十日。”^[3]（卷二《亲飧庙》）其所言十月三十日，正是告谢前一日行飧庙之礼。

而后唐配享先祖情况特殊，同光元年闰四月，追尊自家三庙及唐四庙共七庙于太原。^[2]（卷五《唐本纪第五·庄宗下》）十二月己丑定：“上辛祈谷于上帝，请奉高祖神尧皇帝配；孟夏雩祀，请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请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请奉献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请奉懿祖昭圣皇帝配。”^[1]（卷三〇《唐书六·庄宗本纪四》）至同光二年春正月丁卯，从太原迎七庙神主而至，祔于太庙。^[2]（卷五《唐本纪第五·庄宗下》）另说仅迎祔了高祖、太宗、懿祖、献祖、太祖五位之神主。但这种作法遭到了当时人的置疑：“议者以中兴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杂有国之君以为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别立庙于代州，如后汉南阳故事可也。”不过不管怎样，同光二年春正月戊辰飧太庙，然后行南郊大礼。^[1]（卷三一《唐书七·庄宗本纪五》）长兴元年二月祀昊天

① 可参看陈成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第436页。

② 其但言“其年八月”，顺前则为二年（《五代会要》同），疑错简。同书卷三七《唐书十三·明宗本纪三》记为天成元年，《册府元龟》卷三一《帝王部·奉先四》记天成元年“八月甲午废朝，以庄宗神主祔太庙礼也。”据此，则天成元年不误。

③ 《旧五代史》卷一四二《志四·礼上》入为正文。

上帝于圜丘前于太庙行飨礼，^[1]（卷四一《唐书十七·明宗本纪七》）似仍为前述五神主，即高祖、太宗、献祖、太祖、庄宗。

后唐围绕亲庙追谥，是否加“帝”字还发生了很大争论。天成元年，中书舍人马缜上奏，请依两汉故事，别立亲庙，以表彰皇帝亲人。诏下百官集议，礼部尚书萧顷等揣摩旨意，表示同意：“所奏果符于睿旨，载详固叶于典经”，但最关键的追尊位号及建庙地点，则请皇帝自己“发自宸衷，特降制命。”天成二年(927)春，宰臣郑珣代表中书门下奏上，“载于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则中书意谥为某某皇。但皇帝虽意必加“帝”字，但此时没有表露自己的最终态度，只是说：“诏礼院定其仪制”。太常博士王丕等揣摩明宗心理，援引汉桓帝加其祖、父为“皇帝”之例，请付太常卿定谥。^[4]（卷五九三《掌礼部·奏议二一》）

不过，这时已迁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的马缜又认为，加“帝”字，为“事出非常，不堪垂训”，但知道明宗意为必加“帝”字，又不敢公然违背，只好复述了礼法要求，再请百官集议。百官集议后，由右仆射李琪奏：“伏睹历代已来，宗庙成制，继袭无异，沿革或殊。马缜所奏，礼有按据，乞下制命，令马缜虔依典册，以述尊名。”^[1]（卷一四二《志四·礼上》）这等于回避了矛盾，没有结论，又将问题推给马缜，但其不赞成之意显露的十分明白了。中书、太常、群臣都暧昧表态，使明宗只好亲自出面，以强力来推动，手诏：“不可总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要宰臣百官“集两班于中书，逐班各陈所见。”^[5]（卷一〇七《议追尊名号诏》）

这是强迫群臣表态，李琪只好率先表示同意于祖祢二室先加“帝”字。但明宗并不满意，随后宰臣迫于压力表态：“追尊四庙，望依御札，并加帝号，请于洛京选地立庙。”^[4]（卷五九三《掌礼部·奏议二一》）其所说理由都很牵强，而且更进一步的逢迎，请于京都立庙。此举置武皇、庄宗于何地？故明宗在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后，亦退一步，未在洛京立庙，改为在出生地应州立庙。十二月丙午，^[2]（卷六《唐本纪第六·明宗》）敕：“宜于应州旧宅立庙，余依所奏。”^[3]（卷二《庙议》）为了表彰自己的本生父，皇帝的强权压倒了所谓“礼法”。

后晋、后汉皆未有祀天之仪，也就没有配享之举，但是均有祀天配享的想法。后晋出帝甚至拟定了祀天所配享的神主，明确的说以靖祖配冬至祀昊天上帝。^[5]（卷九七四《奏定高祖郊坛配坐状》）后汉乾佑元年六月太常礼院请修配坐之仪，^[5]（卷九七三《请修制配享献享礼奏》）可见其有意行祀天配享之礼。

后周广顺三年郊天，先于十二月戊申日迎四庙神主至西郊，郭威亲自郊迎奠飨，奉神主入于太庙，设奠安神而退。癸酉日，郭威宿斋于崇元殿。甲戌日，宿于太庙。乙亥，郭威亲飨太庙，并“自斋宫乘步辇至庙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升阶，止及一室行礼，俯首而退，余命晋王率有司终其礼。”^[1]（卷一一三《周书四·太祖本纪四》）

唐制，太庙一年有五次祭飨，为四孟月及腊，后梁亦仿而行之。开平三年七月丙寅，朱温命宰臣杨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庙。^[1]（卷四《梁书四·太祖本纪四》）乾化元年(911)十月有司以立冬太庙荐享上言，诏丞相杜晓赴西都摄祭行事。^[1]（卷六《梁书六·太祖本纪六》）乾化二年(912)正月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庙荐享上言，命丞相杜晓摄祭行事。^[1]（卷七《梁书七·太祖本纪七》）

总的说来，五代祀天祭祖之礼，漫无章法，既无通盘考虑，又无详细规划，多临时决定，其与唐礼、宋礼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 [1]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五代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4]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5]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唐文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通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83.
- [12]任爽.唐代礼制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3]陈成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14]吴丽娱.唐礼摭疑——中古书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5]王美华.十国礼仪制度考[M].任爽.十国典制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6]雷闻.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唐代礼制研究述评[J].唐研究（7），2001.
- [17]盛险峰.五代典章制度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
- [18]耿元骊.五代礼制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
- [19]张兴武.五代艺文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3.

李林甫主持《唐六典》撰修阶段最终完成了《唐六典》的修订、补注的工作，因此，李林甫在《唐六典》撰修过程中有一定贡献。

综上：《唐六典》的撰修历经十六年，四易主持人，十四人参与撰修工作，五个主持人：陆坚、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他们对《唐六典》撰修的贡献各有不同，其中张说、张九龄亲自参加了《唐六典》的撰修。十四位参撰者：徐坚、贺知章、赵冬曦、毋巽、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萧嵩、刘郑兰、萧晟、卢若虚、陆善经、苑咸。从开元十年陆坚被诏修《唐六典》开始到开元二十六年李林甫奏上历经十六年，《唐六典》是集贤院撰修著作中历时最长，用功最为艰难的一部集体创作。

参考文献：

- [1]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Z]. 中华书局, 2005, 4.
- [2] [北宋]王溥.《唐会要》[Z]. 中华书局, 1998, 11.
- [3]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Z]. 中华书局, 1997, 3.
- [4] [南宋]王应麟.《玉海》[Z].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 [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Z]. 中华书局, 1956, 6.
- [6] [宋]程大昌.《雍录》[Z]. 中华书局, 2002, 6.
- [7] [唐]刘肃.《大唐新语》[Z]. 中华书局, 1997, 12.
- [8] [后晋]刘昫.《旧唐书》[Z]. 中华书局, 1997, 3.
- [9]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Z]. 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The Study on the Course of writing *Tang Liu Dian* (《唐六典》)

ZHONG Xing-Long

(Classical Literature Institute,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studies all various historical literature to correct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about writing *Tang Liu Dian* (《唐六典》). The writer follow the before writers of *Tang Liu Dian* (《唐六典》) to divide the course into five stages. The five stages demarcation can reflect the couse of writing *Tang Liu Dian* (《唐六典》) correctl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stage for writing. *Tang Liu Dian* (《唐六典》) had been writing for sixteen years, fourteen people worked for it including four main writer. It was the work which took the most hard work and the longest time in jixianyuan writing book history.

Key words: *tangliudian*; writing

(上接封三)

Explore and Analysis On Sacrifice to God and Ancestors Of The Five-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GENG Yuan-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g 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e rituals systems were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systematic, economical and other aspects and Sacrifice to God and Ancestors w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rituals of happiness. Therefore, it mainly symbolized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Nevertheless, with respect to the rituals happiness, in particular to Sacrifice to God and Ancestors,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in our country. Even though it has a lot of references. Author states tha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true fact of Sacrifice to God and Ancestors in Five-Dynasty and to analyze God and Ancestors respectively based on a lo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Five-Dynasty; Sacrifice to God; Sacrifice to Ancestors